



张一晓 魏 婷

《西域图志》全称《钦定皇輿西域图志》，由乾隆皇帝下令编纂，共 52 卷。《西域图志》作为清代新疆的官修通志，是研究清代西域的重要文献，也展现出一幅幅西域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历史画卷。

共拓疆域、共护边境，奠定各民族广泛交往的基础

《西域图志》记载：“王师先定准夷，继平回部，五年之间，西域全地悉归版图。”“今中外一家，星绍使节，如履康庄，如行内地。”这表明在统一西域后，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营造了安身立命的场所，“天下一家”的族群观念成为共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奠定了基础。疆土既定，维护、巩固和发展则是捍卫西域长治久安的关键所在。《西域图志》记载了乾隆接见各族首领，并进行宴请、围猎、封赏、赐爵等活动，体现了各族首领在政治上接受中央政权的统辖，是国家统一新疆各民族真实、鲜活的写照。清政府灵活的治理手段，促进了内地与西域的交往，“今文武将吏往来西域，与行内地无异”，极大地稳固了中央与边疆的政治关系，体现出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

经贸互动、社会互嵌，拓展全面交流的广度深度

乾隆统一西域后，采取了多种措施推动西域经济发展，因此西域与中原经济交流日益密切，形成了新的贸易带，在族际贸易、藩部朝觐、族群交流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清政府实施屯垦开

发、以边养边的政策，通过多种方式在天山南北发展屯田，改变了西域过去单一的游牧经济，开始多种经济方式并行发展。实施货币统一政策，天山南北与内地一样使用银两，清政府在伊犁铸造制钱，“面镌乾隆通宝汉字，而以设局地名附于背”，显示了国家货币流通的统一，以及新疆与内地经济的紧密联系。实施减赋轻税，“圣天子犹重轸疮痍，苏其困急。酌盈剂虚，取足供军屯之费而止”。一系列的举措促进了西域经济的发展和兴起，《西域图志》记载：吐鲁番之辟展城，“民居鳞接，商贾辐辏”；哈密等地“城外东西两关，地当孔道，商民辐辏，号称殷庶”；叶尔羌城“规模宏敞，甲于回部”；山南诸回部“耕织之外，多善商贾。故西域贾人，自西土以及傍近诸国，无不至”。

清政府对西域当时的教育现状作了判断，“囿于习尚，教化不先”。学校教育是“此学校之制，宜为纪外域者所罕详也”。并且分析教育落后的原因，“又其地与中土隔绝，流移侨寄所不及，诗书羽命之盛，渺乎未有闻焉”。于是，提出了教育目标：“兹际武功告成，文教遐被之余，于商民流寓子弟有造者，栽培乐育以为之倡。将俾倾心内面之倡，耳目濡染，岁月新摩。潜移默化，鼓钟于伦之化，且遍西域而同归也，岂不休哉。”通过在新疆的行商、驻军子弟中推广儒学教育，起到人才示范的作用，潜移默化，长此以往，让西域同中原一样。此外，“乾隆三十二年，因携驻眷兵，招徕民户中，俊秀辈出。各城分设义塾，延师训课，兼习骑射。兵民踊跃，造就多人。三十四年，初设迪化宁边两厅学”。由最初办义塾，后升级为正式的官学，即厅学。清朝在西域共设有七所官学、七座文庙，“版户鳞集，学校与州郡并建。莘莘俎豆，济济生徒，视内地无异”。可以看出，清政府建学校、修孔庙、行科举，通过发

展文化教育，提高民众素质，增强文化向心力，以此实现长治久安。乾隆四十二年秋季的陕甘乡试，有迪化州籍者得中为举人，“由是感激奋兴，科第蔚起。固北庭西海之间，伊古未逢之隆轨也已”。这不仅对西域举子有极大的鼓舞，也是清政府在西域大兴教育取得的显著成绩。

清朝在西域实行“屯垦戍边”和“移民实边”并行的政策，西域各部落逐渐拆去藩篱，彼此交流，走向融合。一方面是中原人口迁至西域。《西域图志》记载，清政府在伊犁、乌鲁木齐、奇台、巴里坤、吐鲁番等地设置满营，兴建满城，如“皆兼设满营绿营，分兵防守”；允许官兵携带家眷永久驻防满城，如“驻防满洲、蒙古、锡伯、索伦、察哈尔诸兵，虽携眷居住，未可与彼中户口同论”；定期到塔城、叶尔羌等地换防，如“于西安、宁夏驻防兵内移驻”。清政府还从内地招募来西域屯田的民户、遣犯，“以招募安插民户”，开垦种地，从事农业生产。因此，从乾隆二十六年到乾隆四十五年，是内地人口迁入西域地区比较集中的时期，到清末，汉族已经遍布全疆各地了。另一方面是西域各族群的迁徙。“爰为屯兵驻守，招集回部及甘州民户，分地而居。而于乌鲁木齐、昌吉、罗克伦、伊犁诸处，计亩耕作。盖屯垦之丁男，即西域之户籍也。”鉴于回部人习种植，而准部地无耕植，乾隆时曾迁移回部人到准部伊犁河谷，从事农业生产。“始则移回部之人民，理准疆之滕畎。嗣是农功日辟，赋役有经。不惟山南习耒耜之勤，即山北亦有口分之业，不数年来蔚成都会。”人口的迁徙，使得西域各民族共同生活、练兵、生产、经营等，“并以时简阅训练，与内地无异”“从此天山南北，一体涵濡”，逐步形成了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发展大趋势。

万里东归、民族认同，彰显深度交融的共同体意识

经过清政府长期的励精图治，西域民族融合和中华整体观念在大一统格局下深入人心。例如乾隆三十六年，“土尔扈特渥巴锡等，以其部众三万余户，行经万余里，不藉招徕，款关内附”。乾隆亲撰多首赞颂的诗篇，其中《宴土尔扈特使臣》诗中“覆瓿谁可殊圆盖，中外由来本一家”一句尤具深意。

在新疆统一的过程中，地方少数民族首领也积极响应清政府的号召，展现了强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西域图志》记载，吐鲁番地区维吾尔族首领额敏和卓“乾隆二十四年，西域平，复还故地”。1758 年，额敏和卓还参与了平定大、小和卓之乱。《西域图志》中的《紫光阁五十功臣像赞》指出，额敏和卓“知无不言，言无不宜。其心匪石，不可转移”。此外，清朝在统一西域的过程中，得到了西域民众的大力支持。“大军未至城百里外，回民扶老携幼跪迎，争献牛酒”“久思归附圣化”“壶浆箪食迎王师”生动体现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共同的国家认同和浓烈的家国情怀不仅为西域和平与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为中华民族团结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西域图志》可以看出，清政府在西域塑造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共同性不断增长，融为一体的态势占据了主流。书中详尽的历史史料科学印证了西域各民族汇入中华民族、融入中华文化、认同中华制度的事实，证明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必然途径。

坚持职普融通、产教融合，推广“双元制”办学模式，持续扩大应用型高等教育中外合作示范效应，加快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深做实职务科技成果赋权和科研项目经费“包干制”改革，加快推广中国科大职务科技成果“赋权+转让+约定收益”改革模式，实现成果所有权充分赋权、成果收益权长期共享。聚焦打造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的“试验田”、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高产田”，高标准建设“科大硅谷”，办好中国科大科技商学院，营造一流创新生态。坚持“产业导向、责任明确、分类管理”，与知名高校院所、顶尖人才团队、龙头企业等，共建一批运行机制灵活的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培育高层次人才队伍，实施高水平科技攻坚，推进高效能成果转化。健全市委科技委全面统筹工作机制，完善“职能部门+事业单位+科创集团+科技金融+园区载体”工作体系，实现“全市一盘棋”推动科技创新。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加快形成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服务、支持、激励的有效机制，广泛引育战略人才、产业人才、青年人才。坚持向用人才主体授权、为人才松绑，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让“养人之城”更养人、“创新愉快”更愉快。

习近平总书记对安徽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对下一步工作提出明确要求。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殷殷嘱托转化为奋进动力，自觉当好践行者、行动派、实干家，拿出“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劲头，坚定走好科技创新必由之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助力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努力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系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

郭子仪被后人评价为“大雅君子”和“社稷纯臣”。国家有难时，他挺身而出，只考虑是否有利于国家的治理而不计较个人的安危；他不贪恋官位，主动避让贤路；他与同事及部下相处，最大的一个特色是“御下恕”，为人处世讲究宽厚之道。而他的“宽厚”，并不是纯粹对同事的迁就和对部下无原则的宽松，而是在有利于国家治理的前提下待人真诚。郭子仪的为人处世之道，是成就他“完名高节”极为重要的因素。

《旧唐书》卷 121《仆固怀恩传》说：“郭子仪为帅，以宽厚容众。”同卷《李怀光传》也说：“子仪性宽厚。”《旧唐书》郭子仪本传上引裴垍的话说：“汾阳……临下宽厚，每降城下邑，所至之处，必得士心。”裴垍还拿他与李光弼相比：“始与李光弼齐名，虽威略不逮，而宽厚得人过之。”从这些记载来看，郭子仪是以“宽厚”出名的，无论是他的同事还是一般的士卒，对他都是心服口服、感恩戴德的，所以部下和他的关系比较特殊，简直到了亲密无间的地步：“麾下老将若李怀光辈数十人，皆王侯重贵，子仪颇指进退，如仆隶焉。幕府之盛，近代无比。”这样的宽厚仁爱，使郭子仪与部下的共事合作相处能够和谐圆融。

即使是关系不和睦的同事和部下，郭子仪亦不计个人恩怨，尽力提携。与李光弼的关系是最能说明问题的。李光弼和郭子仪素来矛盾很深，杜牧在《樊川文集》中也曾记载：二人“虽同盘饮食，常睨相视，不交一言”。但郭子仪不因私怨而对李光弼不利，而是坦诚相待，在合适的时候予以提携。《资治通鉴》卷 217 记载：至德元年元月，“上命郭子仪罢围云中，还朔方，益发兵进攻东京；选良将一人分兵先出并陞，定河北。子仪荐李光弼，癸亥，以光弼为河东节度使，分朔方兵万人与之”。正因为有了郭子仪的厚待提携，李光弼和郭子仪才能多次商议作战计划，协同指挥，并使李光弼能独当一面，甚至与郭子仪平起平坐。如至德元载五月，郭子仪和李光弼在常山与史思明作战，《资治通鉴》卷 218 记载两人的具体指挥：“子仪至恒阳……贼不得休息。数日，子仪、光弼议曰：‘贼倦矣，可以出战。’”《考异》说：“《河洛春秋》以为此为光弼语，《汾阳家传》作子仪语，盖二人共议耳。”能够如此协同作战，说明李光弼和郭子仪的关系在此后是十分融洽的。

如仆固怀恩，本是郭子仪手下的大将，作战勇猛，在与安史叛军的作战中屡立战功，为收复两京“皆立殊功”，但他脾气暴躁，“刚决犯上，始居偏裨之中，意有不合，虽主将必诟怒之”。也就是说，他一旦脾气上来，连郭子仪也会骂。然郭子仪“以宽厚容众，素重怀恩，其麾下皆朔方蕃汉劲卒，特功怙将，多为不法，子仪每事优容之，行师用兵，倚以辑事”。《资治通鉴》卷 222 记载：肃宗宝应元年十一月，河朔平定，郭子仪认为仆固怀恩有大功，“请以副元帅让之”，朝廷遂以怀恩为河北副元帅，加左仆射兼中书令、单于、镇北大都护、朔方节度使。郭子仪能容忍仆固怀恩对他的不敬，利用他的才能共同作战，在关键时刻又尽力提携他，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纵观郭子仪的一生，我们发现他的“宽厚”，并不是无原则的，对不利于国家社

郭子仪的宽厚与原则

张剑光

稷安危的事情处理起来就极为严格。肃宗宝应元年，朔方等诸道行营都统李国贞治军严苛，遭到将士抵触，部将王元振发动兵变，在绛州杀了李国贞。五月，朝廷派郭子仪前去处理。因为郭子仪平素对士兵十分宽厚，所以王元振想郭子仪会同情自己。但郭子仪说：“汝临贼境，辄害主将，若贼乘其衅，无绛州矣。吾为宰相，岂受一卒之私耶！”于是将王元振及同谋者 40 人全部正法，史书说“由是河东诸镇率皆奉法”。显然郭子仪的宽厚是有底线的，谁对国家社稷不利，即使是心向自己的士兵也是杀无赦。

再如代宗广德元年，羽林军射生将王甫入城阴结少年数百，夜间击鼓大呼于朱雀街，吐蕃以为唐军入城，吓得全部逃出了长安。之后王甫自称为京兆尹，聚众至 2000 多人，“暴横长安中”。郭子仪进城后将王甫斩首，“京畿遂安”。次年二月，郭子仪任朔方节度大使，至河中，“云南子弟万人戍河中，将贪卒暴，为一府患，子仪斩十四人，杖三十人，府中遂安”。不久，郭子仪派牙官卢諲到汾州核查都虞候张维岳乱杀官员的情况，卢諲受了张维岳的东西，替张维岳说好话。卢諲回来后，郭子仪“恶不比于己者，好赂于己者，公捶杀之”。

宽厚坦诚与坚守原则的处世之道，使得后人对郭子仪的评价相当高。学者们曾对唐中唐平叛诸将帅进行善析，发现只有郭子仪得以善终，这固然与唐室抑制地方势力、加强中央实力、强化皇权的措施相关，亦与唐室防范统兵将帅的措施有关，但更与郭子仪个人的性格、修养和宽厚的为人处世之道有关。他身先士卒，能够关心部下，与手下的将领及士兵和善相处。他对手下将领和士兵宽厚，对他们赏识和提携，但是任何人违背了原则，不利于家国社稷，他又能做到铁面无私，绝不姑息迁就。郭子仪泾渭分明的为人处世之道，是他成就一世英名极为重要的因素。

